

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研究报告之一

七

星

河

三江平原古代遗址
调查与勘测报告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01K-0902.0101)

书名题签：宿 白

ISBN 7-03-012460-X



9 787030 124609 >

ISBN 7-03-012460-X

定 价：350.00 元

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研究报告之一

七星河

三江平原古代遗址
调查与勘测报告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关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三江平原腹地七星河流域汉魏时期古代遗址的调查与勘测报告。书中刊布了在七星河流域已调查发现的426处遗址,其年代范围为两汉至魏晋时期。书中除介绍了该区域的自然地理和考古工作状况外,重点介绍了各遗址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分布范围、时代、功能、保存现状及所暴露的遗迹、遗物等情况。对了解三江平原地区汉魏时期古遗址的分布状况、文化发展和人类活动等,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对解决古代遗址的保护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学、历史学、古环境学等方面研究的人员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ISBN 7-03-012460-X

I. 七… II. 黑… III. ①文化遗址—考古—调查报告—黑龙江省—两汉时代②文化遗址—考古—调查报告—黑龙江省—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K87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4614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 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A4 (880×1230)

200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5 3/4 插页:25

印数:1—1 400 字数:1 000 000

定价:3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顾 问 张忠培 黄景略

主 编 杨志军 许永杰

编写人员 王学良 张 伟 黄星坤 赵永军 田 禾 陈德恩

绘 图 张兆国 朱洪敏 王晓红 赵湘萍

摄 影 许永杰 方 琦 王世杰

英文提要翻译 胡秀杰

序

我期盼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调查与勘测出现如今的结局，已有12年了。

12年前的1992年，杨志军拿着一大卷三江平原城址实测图来到小石桥向我介绍，或者说让我欣赏这些镶嵌在三江平原的城址的时候，引起我极为兴奋之余，又勾出了埋藏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些往事。

1971年10月，我以顾问身份被黑龙江博物馆邀请主持了饶河小南山的小规模的考古发掘，随后沿着乌苏里江自饶河至虎林作了一些点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十来处遗址。这次工作中取得的这些小小的收获，使我愉快地摆脱了这次刚入哈尔滨听取某人介绍自己新近饶河考古调查所产生的忧心忡忡，感受到了从困境中走出来的愉悦，使我愉快地体验乌苏里江那动人的秋景，以及那被人忘却了的却仍然埋藏在这肥沃土地中的史篇。1983年，我为了继续探明乌苏里江的历史，也为了学生的教学实习，派了一位教师带领79级学生来到桦南、集贤、宝清进行专题调查，发现了炮台山、蓝凤山、农机站、兴华1号、兴华2号及涌泉炮台山等十几处城址，这令我兴奋，但在对学生论文答辩时，我却发现这位教师对学生的业务指导不力，工作颇为粗疏，甚至用远距离瞭望代替了应该进行的实地考察，并且兴奋地告诉我：这城址保存得非常好，只是位于山上，又距离远，爬不上去。他的关于这次实习的叙述，除了兴奋于自己的成绩外，就是一“苦”字。至于“成绩”，他连这些城址所含陶器组合都未能搞明白，至于这些城址所属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性质自然也就不能明瞭了。这如何搞好科研，又如何能教好学生？

杨志军关于这些古城的介绍，使我立即意识到这些城址是三江平原文化与文明走到了新时代、步入了城邦林立时期的标志，对它们的结构与布局的社会学式的深入解析与研究，不仅能认识这些城址所处时代的社会性质，或也能从中获得启开遗存保存情况较差、处于类似三江平原城址群所处社会演进阶段的其他考古文化遗存群奥秘的一把钥匙。不过我这时的关于考古学问题的思考，正如自己在《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序中所说的那样，出于对考古学局限性和考古学持续良性发展的认识，已从偏重于单纯的考古学学术课题的研究转向考古研究如何做好地下遗存的保护上来，因此，我和志军的这次谈话，尽量地抑制着不时涌现出来的单纯探索考古学术课题的激昂起来的兴趣，希望他全面地调查、勘测清楚这些城址的分布，探明其年代，并依据法规将它们全面地保护下来，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点试掘和发掘，以搞清楚不同类型城址的结构，以及城址是否存在着群分的问题，如果存在着群分，那些群中的

诸城址（遗址）相互之间，以及群与群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要究明这些问题，自然不是三几代考古学者可以完成的研究，所以首先就得将它们保存下来。将它们保存下来的另一目的，或许是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目睹古人留下的这些城址。至于后代的考古学者和不同职业的人群能从这些城址体验出什么？我相信他们会比我们这代人更聪明，就无需我们去设计了。通过交谈，我的这些想法，便成了我和志军的共同追求。

随后，我于1993年、1995年和2001年赴三江平原进行了实地考察。1993年8月的这一次和我同行的有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孟宪民、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杨志军和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乔梁。我们除实地考察一些城址外，还观察了一些调查与试掘收集的陶器标本，指出它们存在着年代上的区别，认为这些城址基本上属于汉魏时期。1995年7月，我和黄景略、王军、滕铭予及杨晶，又一次考察了三江平原的城址。我们进一步肯定了这些城址的重要性，并认为还是应集中精力做好调查与勘探，摸清底细，做好保护工作，及时写出报告。1997年12月，杨志军出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三江平原的工作计划交由许永杰负责执行，同时又邀我做些督导工作。这样，除了许永杰和我经常讨论这一工作外，又于2001年6月邀我、陈雍、许伟及杨晶再次踏上了三江平原。这次像以往那样，边进行实地考察边进行讨论，一致支持许永杰用新的技术进行的调查、勘测和对凤林、保安古城的试掘，支持多学科吸取遗存的信息，同时，指出调查、勘探和试掘、发掘原则上应分两步走，当前应制定好完成调查、勘探和编写报告的规划，并在总结以往调查、勘探的得失的基础上，编定好调查、勘探提纲或指南。规划应明确目标和日程，具有操作性，然后集中人力、时间、物力，保质保量地将《规划》付之于实践，定期编写好《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这次边考察边讨论的行程中，陈雍、许伟、许永杰和杨晶详细讨论了许永杰提出的《规划》和《指南》，并将它们确定下来。事后，许永杰将这《规划》和《指南》向杨志军作了汇报，并得到他的确认。志军委托我担任的督导工作，便如此这般地进入了攻坚阶段。

说明三江平原的这些汉魏时期的城址为什么应得到保护，如何保护，例如保护哪些城址，应属于何等级别的保护，保护的范围及基本要求，是开展七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调查与勘测的直接目的。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了。2001年，国务院将其中的47处遗址列入了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同时，许永杰以倒计时方式，组织人力，集中时间，顽强拼搏，实现了《规划》，终于2003年4月向杨志军交出了《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初稿，杨志军作为主编除了认真审阅《报告》初稿并提出详细的修改要求外，还邀我审阅这《报告》初稿。我将这项工作，转包给了朱延平。朱延平像杨志军那样，也写出了数千文字的审读意见书，交给了许永杰。许永杰据杨志军、

朱延平的意见修改了《报告》，最后经杨志军审阅定稿，可见，他们的这些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是在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工作的基础上，又通过十多年的众多考古工作者艰苦奋斗，参考了覆盖全七星河流域的万分之一地形图和早期航片，经过大规模全面、细致地实地踏查，现场仔细地观察与认真地分析暴露于地面的遗迹、遗物的基础上，刊布出来的经科学测绘和记录的426处遗址，其中包括城址113座，遗址313座，我们虽不敢说没有遗址被遗漏了，却可肯定被遗漏的遗址也仅是个别的，可以说七星河流域能从地面上观察出的遗址，或据散布于地面陶片能确认的遗址，都已被调查确认出来而收录在这本报告之中。像这样对一整条河流进行的专题性的区域考古勘查，和赤峰考古队在半支箭河中游进行的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一样，在全国尚属首次，其完整性和系统性，也如半支箭河调查那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开了考古学的先河。

《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中的《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登记表》十分重要。此表的主体内容有两大项，一是关于遗址所处经纬位置、行政归属、海拔高度、自然环境；一是遗址面积、暴露的遗迹及遗物、保存状况。这些内涵和《遗址介绍》一章的《遗址数量与分布》、《遗址形制》及《遗址功能》的插图、照片、文字描述与数量统计，加上《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分布图》及16幅各遗址群图，共同组成了这报告的基础。这既是深入展开学术课题研究的基础，又是深化文物保护的学术基础。

《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中的《遗址分布规律》与《遗址形制》、《遗址功能》及《遗址分群》的分类，在较为客观地具体介绍、综合叙述调查、勘测资料的前提下，同时还包含着《报告》作者自身的学术认识。这些学术认识，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或者说是以材料为根据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启迪性。例如，《报告》将“汉魏遗址群在七星河的中游有着高度集中的密集分布”的现象归结为自然环境原因，这在目前掌握的资料情况下，当是一种可取的解释。这一解释对于探讨其他河流同时期遗址分布疏密的原因来说，或许还有参考意义。同时，有些城址或遗址的“形制”或“功能”的归属，以及有些城址是否应归为“城址”还是当编入“遗址”，和“瞭望址”、“要塞址”的划分是否必要，乃至“遗址分群”的前提、应如何分群以及一些遗址的群属的问题，都存在一些可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报告》作者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认识，尽管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具有启发性，但仍只能视为是有待未来实践的检验，乃至仅是提供讨论的一种认识。

总之，《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是建立在长期大规模踏实调查、勘测且认真写出来的学术信息丰富的考古著作，是已为文物保护并将为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提供了学术基础的学术报告。面对这样长期工作

才能产生的坚实著述，我发出了人生苦短的叹息！

张忠培

2004 元月 20 日上午

前 言

当本报告即将付梓之际，我的确有许多感想。

三江平原上至今仍分布着数量极为可观并且保存状况相对较为完好的古代遗址。通过历年的调查、发掘，其中一批遗址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汉魏时期。这些遗址的分布规律、聚落布局、表现形态以及文化内涵具有很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而与三江平原周边地区已知的考古学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我们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就黑龙江省考古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可以考虑做些深入持久的工作。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应该归功于几位先生的殷殷指点。

早在1982年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时，从学术角度出发，为了能在宏观上把握全省的考古学研究方向，找准切入点，开展苏秉琦先生倡导的区系类型研究，我曾专程到吉林大学就教于张忠培和林沅两位先生。他们指出，可以把重点先放在嫩江流域或三江平原，嫩江流域解决与中原的联系问题，三江平原解决与黑龙江北岸前苏联境内的一些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1982~1986年，我们在嫩江流域连续发掘了其文化性质属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肇东县东八里、肇源县卧龙、白金宝、泰来县平洋砖厂、战斗、富裕县小登科等遗址和墓地。丰富的发掘资料，推动了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深入研究和讨论。

1992年我从省民族博物馆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分管文博工作不久，就开始酝酿将三江平原考古列为省里的战略重点，拟先从汉魏时期遗址入手，全面普查，详细记录，然后区分类型，从每一类型里面选择典型遗址，进行试掘或发掘，在搞清文化面貌的基础上，溯源探流，逐步建立起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为此，我相继拜访了宿白、俞伟超、刘观民、张忠培、黄景略、严文明、林沅等先生。诸位先生提出的深刻的指导性意见及热情鼓励，在坚定我的决心的同时，也使我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如果说本报告的出版能够对学界和文物保护有所裨益的话，那么，我的体会是：任何一项重要的业务工作或学术活动确定开展之前，特别是那些时空跨度和规模都比较大的系统工程，依靠具有真知灼见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可以收到高屋建瓴事半功倍之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入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并日趋尖锐。面对众多的文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和消失的新形势、新情况，李瑞环同志于1992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适时地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

据此,审视以往的工作,我们重新给三江平原汉魏遗址调查明确定位:它既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学术研究课题,也是一次扎扎实实的文物保护的实际步骤,调查研究首先应着眼于保护,服务于保护。

这本报告的出版,标志着我们基本上达到了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双丰收的预期目的。它的学术价值,容当日后读者见仁见智。从立足于保护的角度来衡量,在摸清文物家底方面取得的成果尤其令人振奋。我们在七星河流域 3985 平方公里范围内,不但发现了 426 处汉魏遗址,而且拍摄了全部遗址照片,实测了大部分遗址,详细记录了每处遗址的保存现状。这样,在为“四有”建设提供大量第一手素材的同时,也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普查成果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肯定,许多遗址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格外令人鼓舞的是,总计有 47 个遗址进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总结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就目前的认识水平和亲身实践而言,我的体会是:处理好学术研究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不单单是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责任,也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义务,考古工作者首先应该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应该牢牢树立起考古学术研究紧紧地围绕着保护开展的理念。只要这种理念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并非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田野考古方法有普查、专题调查、试掘、发掘之分。我们采取的是专题调查和试掘相结合的方法,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同时运用航空遥感考古资料、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现代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地提取各种信息。在 1980 年,我们便开始尝试和实践“按图索骥”的方法,即利用大地航拍照片提供的线索,再参照大比例尺地图,然后直奔目标进行现场调查确认。因为地表遗迹尚清晰可辨,所以大部分汉魏遗址基本上都是按图索骥的结果。

目前,三江平原的产业结构仍然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农业经济。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抢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潮来临之前,尽可能地了解和掌握文物的数量、分布范围和保存状况,划定具有法律效力的保护范围,制订保护规划。

狭义的三江平原面积约有 4.5 万平方公里,显然,费时费力的发掘手段难当此任。实际上,我们在七星河流域经过试掘和发掘的地点仅有 4 处,目的就是大体上弄清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年代和遗址的内涵、范围,以便于界定某个遗址的价值和地位,从而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决定采取何种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七星河流域面积是三江平原的十分之一。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的调查勘测,我们用了将近 12 年的时间。显而易见,即使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要想在短时间内摸清三江平原汉魏遗址的底数,那也绝非易事。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物保护仍然面临巨大冲击的严峻形势下,考古工作者应该把认识统一到以保护为主的前提上来。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文物被破坏了，考古研究的对象将随之消失。尽最大的努力把更多的文物保护下来，是时代赋予考古工作者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在这种背景下，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就涉及到考古方法论的问题，我的体会是：尽管发掘和调查都能为文物保护做贡献，但是调查更为实用，效率更高。调查本身同样也可以解决很多学术问题，例如同一文化的遗址分布问题，如果遗址保存状况较好，遗址的大致结构也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

科学决策、统一认识和方法论的问题解决之后，就是实际操作的问题。这项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艰苦工作，要想达到预期的愿望，没有有关部门和各方面人员的重视、支持、参与，肯定是无法想像的。承担此项任务的考古工作者，没有辜负领导和专家的殷切期望，他们满怀对文物事业的执着追求，团结合作，锲而不舍，不计得失，不辞辛劳，包含着先前的工作在内，可以说是20年磨一剑，终于向学界和社会交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在此，我谨以崇敬之情，向国家文物局、黑龙江省文化厅、黑龙江省文物局、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友谊县人民政府、宝清县人民政府、富锦市人民政府、集贤县人民政府和诸位领导、专家、考古工作者（所有参与过此项工作的同志的名字，我们在正文中都已一一提及，这里不再重复）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要特别感谢宿白和张忠培先生。宿白先生始终关怀黑龙江的考古事业，这次以耄耋之年又欣然为本书题签，我们倍感荣幸。张忠培先生为此项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时间，他曾三次带助手亲临现场具体指导，从立项到实施，再到编写报告，最终审核稿件和撰写序言，每一个环节无不浸透着张先生的心血，令我们终身难忘。

杨志军

2003年11月于北京

凡 例

1. 《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收录了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宝清县、集贤县、富锦市5市县境内七星河流域的汉魏时期遗址426处。分布在这一流域内的其他时期的少量遗址未作收录。

2. 本报告所使用的“汉魏”时代概念，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简称。

3. 《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是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课题最终成果之一。试掘与发掘、遥感与环境等技术手段获得的成果将在其他成果形式中报道。

4. 本报告采用文字、线图和图版三种表现形式报道材料。线图上的遗址遗迹图（全为子午北方向）采用平板测绘仪野外测绘，Sv300测绘软件室内制图；遗址分布图由哈尔滨Weltop公司利用Sv300测绘软件制成；器物线图是手绘生成的。图版均为彩色野外照，利用负片、正片和数码照片制片。

5. 在遗址分布图中，全流域的遗址分布图遗址按其形制标注，有环墙或环壕等防御设施的“城址”用涂黑正方形标注（■），无环墙或环壕等防御设施的“遗址”用涂黑三角形标注（▲）；遗址群分布图遗址按其功能标注，居住址（⊙）、防御址（⊙）、祭祀址（⊙）、瞭望址（⊙）、要塞址（⊙）等图例采用国家文物局编制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同类或近似类图例。

6. 在《七星河流域古代遗址登记表》中，只设“遗址功能”一栏，“遗址形制”则在“遗址名称”和“遗迹”两栏中体现。

7. 在遗址的命名上，本报告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1）以遗址所在地所属村屯的名称命名。由于七星河现代居民点的密度低于汉魏遗址的密度，历年调查时常常遇到一处居民点附近有多处遗址的情况，最初以遗址所在居民点的方位命名，如“哈建西山”、“哈建东山”、“哈建北山”、“哈建东北山”等。尔后发现一处居民点的同一方位有两处以上遗址的情况后，便又以遗址所在地形命名，如“民富南”、“民富南坡”、“民富南山包”、“民富南岗”等。如此，给遗址命名带来诸多不便和混乱。遇有这种情况，本报告则采用国际通例，使用居民点加数字序号命名，如“民富1号”、“民富2号”、“民富3号”、“民富4号”、……“民富N号”。在《七星河流域古代遗址登记表》的“遗址名称”一栏中，括注原有名称。

（2）以能体现遗址所在地形的小地名命名。如“土门岭遗址”（属友谊县龙山镇林场）、“筒子沟1号遗址”（属友谊县龙山镇西峰村）、“西炮台山1号城址”（属双鸭山市宝山区双鸭山农场煤矿）等。

（3）以能体现三江平原昔日荒原风貌的旧地名命名。如“老鹳窝遗址”（属富锦市兴隆岗镇联兴村）、“小老鹳窝遗址”（属富锦市兴隆岗镇联兴村）、“狼洞沟城址”（属双鸭山市宝山区七星镇园林队）、“择林地窝棚遗址”（富锦市向阳川镇择林村）等。

（4）改换原遗址命名中的不雅名称。如原“苍蝇山遗址”改为“猴石3号遗址”（属友

谊县兴隆镇猴石村)、原“小坟山城址”改为“十四队1号城址”(属双鸭山市宝山区双鸭山农场十四队)、原“王八脖子遗址”改为“王脖子遗址”(取其谐音)等。

(5) 改换原命名中用两处村屯命名的名称。如原“长爱城址”是采用长胜村和爱林村两个村屯的首字命名的,现改为用城址所属的爱林村命名。

(6) 在重名的遗址名称上加“村”或“屯”字以区别。如友谊县和宝清县都有“新民”遗址,在命名时,就在宝清县新民遗址上加“村”,称“新民村遗址”。

8. 遗址群的命名主要是采用其所依托的山体、岗地、支流、河流的名称,如果这些地理单元无名称,则采用地处这一地理单元中现代较大的居民点附近遗址较多的居民点名称来命名。

9. 遗址所在地的行政区划存在着市、县(县级市、市属区)、乡(镇)、村(屯),农场、分场(林场)、队(砖厂、鹿场),煤矿、居民委员会3个系列。其中,县、农场、煤矿属同一级别;乡、分场属同一级别;村、队、居民委员会属同一级别。本报告在属于农场系统或煤矿系统的遗址行政区划上附加市、区、县,是因为文物遗存的管理是市、县系列负责的。

10. 遗址采集的遗物标本编号由字母和数字符号组成。前三位数字为遗址的代码编号,第一个字母为遗址所属的市、县级行政区划名称的首字拼音的辅音字母,第二个字母为遗址名称的首字拼音的辅音字母。器物号为阿拉伯数字顺延。

11. 遗址的位置是采用两个标准表示的。一是用经纬度和海拔高程表示,因所使用的大比例地形图不同,中上游高程是采用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下游高程是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遗址的高程点是以遗址的中心部位确定的;一是用遗址距所属村屯和附近河流的距离表示,距离是在大比例地形图上量得的直线距离。

12. 遗址或城址的面积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计算方法是有地表坑或环墙、环壕等遗迹的遗址或城址,以遗迹的范围计;一种计算方法是没地表坑或环墙、环壕等遗迹的遗址或城址,以陶片等遗物的分布范围计。后者的计算方法可能较前者的计算方法面积要大,这是因为,遗物是可以移动的,而遗迹则是不可移动的。

13. 在《七星河流域古代遗址登记表》中,遗址的保存现状使用四个等级,“好”,是指地表为林木覆盖;“较好”是指地表已辟为耕地,但地表遗迹尚可辨识;“较差”是指地表已辟为耕地,地表遗迹不可辨识;“差”是指遗址遭到人为破坏,如采石、挖沙、取土、开辟为墓地等。

目 录

序	张忠培 (i)
前言	杨志军 (v)
凡例	(ix)
壹 自然地理	(1)
一、地质地貌	(1)
二、气候	(4)
三、土壤	(5)
四、植物动物	(5)
五、七星河流域	(7)
六、环境演变	(9)
贰 考古工作	(11)
一、三江平原考古工作简史	(11)
二、三江平原考古学文化编年与序列	(13)
三、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考古工作	(20)
叁 遗址介绍	(32)
一、遗址数量与分布	(32)
二、遗址分布规律	(38)
三、遗址形制	(41)
(一) 城址	(42)
1. 单垣城址	(42)
2. 双垣城址	(92)
(1) 环接城	(92)
(2) 并列城	(104)
3. 三垣城址	(115)
(1) 环接城	(115)
(2) 并列城	(125)
4. 多垣城址	(129)
(二) 遗址	(133)
四、遗址功能	(255)
1. 居住址	(255)
2. 防御址	(319)
3. 祭祀址	(346)

4. 瞭望址	(357)
5. 要塞址	(363)
五、遗址分群	(376)
肆 结语	(406)
参考文献	(409)
附表 七星河流域遗址登记表	(411)
英文提要 (Abstract)	(540)

插图目录

图 1-1	三江平原位置图	(2)
图 1-2	七星河上游地貌景观(双鸭山市境内)	(3)
图 1-3	七星河中游地貌景观(宝清县境内)	(4)
图 1-4	七星河下游地貌景观(富锦市境内)	(4)
图 1-5	早春时节的七星河中游	(7)
图 1-6	如今的三江平原已大部分实现了机械化作业,但牛拉车仍是农民日常重要的劳作工具	(8)
图 1-7	静寂的古遗址,常常被密集的现代村镇和工业厂区包围	(9)
图 1-8	在三江平原如今还能见到集体劳作的场景	(10)
图 2-1	在调查中采集遗物必不可少	(11)
图 2-2	对遗址进行钻探是了解遗址文化堆积情况的重要手段	(12)
图 2-3	遇到有断层剖面的遗址要更为详细地进行记录	(12)
图 2-4	重点遗址的断层剖面要专取土样,作孢粉研究	(13)
图 2-5-1	万里霍通新石器遗存	(14)
图 2-5-2	饶河小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存	(14)
图 2-5-3	倭肯哈达洞穴遗存	(15)
图 2-6-1	桥南文化	(16)
图 2-6-2	滚兔岭文化	(16)
图 2-7-1	凤林文化	(17)
图 2-7-2	同仁一期文化	(17)
图 2-8-1	绥滨 3 号墓葬遗存	(18)
图 2-8-2	绥滨中兴、奥里米金代遗存	(18)
图 2-9	依兰永和、德丰清墓	(19)
图 2-10	白天野外踏查,晚间抓紧时间进行资料整理	(20)
图 2-11	现代人仍喜欢在古遗址上生活。考古队员既可以稍做休息,同时又算“访贫问苦”,了解遗址的存在状况	(20)
图 2-12	在调查途中,考古队的“坐骑”免不了受到“铁牛”兄弟的扶持	(20)
图 2-13	考古钻探	(20)
图 2-14	考古测绘	(21)
图 2-15	环境考古打钻取样工作现场	(23)
图 2-16	环境考古打钻取样工作现场	(24)
图 2-17	浮选工作现场	(25)
图 2-18	1999 年秋进行遥感考古卫星定位系统地面定位	(26)
图 2-19	1998 年友谊县凤林城址七城区发掘现场	(27)